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余根雄

摘 要: 当今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与所遇到的问题, 促使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之间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曾明确地阐发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马克思认为, 共产主义革命与其他一切革命的差别在于是否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现状; 真正的革命并不是作“表面文章”, 而是深入到人民现实生活中的变革; 革命也不是确立“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革命实质上是人们自己改造自己的自我革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证明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 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 更是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的具体呈现, 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关键词: 共产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改革; 社会革命; 政治革命

中图分类号: A811.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0)06-0009-09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0.06.002

新时代下, 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与否, 关系到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成功与否。如何深入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 在理论上的要求就是: 如何深刻理解改革的本质, 即什么是改革; 如何清晰厘定改革的标准, 即怎样改革; 如何准确把握改革的方向, 即往哪里改革。中国的改革, 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更作为马克思主义之实践的改革, 若要搞清楚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 就有必要从马克思那里汲取营养。马克思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有深刻的理论意涵和现实意义, 能对我们理解和解答上述问题有所助益。

一、共产主义革命与其他一切革命的差别

以往我们对“革命”的理解通常持保守的态度。它充满对抗、暴力、甚至流血、牺牲, 以至于在和平年代, “革命”在一定时期成为学界一个较为敏感、避讳的字眼。如今, 此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较大的纠正, 我们通常把“革命”理解成对现存状况的否定与改造, 或直接与“改变世界”联系起来。这无疑为马克思的革命观找到了传承和发展的空间。当今中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 也正是需要革命精神的时候。这就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更准确地把握革命与改革的关系。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马克思文本阐释的哲学基础研究”(zt2005)

作者简介: 余根雄, 哲学博士,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yugenxiong@sina.cn (浙江 杭州 310028)

因此，这种“否定”、“改造”或“改变”应进一步深入地展开和深化。

恩格斯曾鲜明地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的“革命”不仅是作为一名思想家的哲学革命，而且是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社会革命。纵观人类历史，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都出现过程度不同、范围不等、影响不一的社会革命。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革命，农民反抗封建地主的革命，资产阶级反抗皇权贵族的革命，纷纷扰扰、此起彼伏。而马克思则将人类的命运引导到了一场全新的革命中来，这场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首先区分了共产主义革命与之前一切革命的差别。他认为，之前的一切的所谓“革命”始终没有触碰到革命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农民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只不过是形式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却从未根本触及人的现实生活。农奴革命建立的封建王国，只是更替了皇室贵族的血脉；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民主国家，只是用物的统治来代替人的统治。此类种种都没能改变人们受奴役、受剥削、受压迫的生存状况，改变的只是人们受奴役、受剥削、受压迫的形式以及奴役、剥削、压迫的主客体。因此，马克思论道，“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革命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些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1](P170)}。就整个人类的发展来说，这些革命可能可以使得某一些具体的人、某一个阶级得以暂时的解放，可以使其从受奴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但这是以另一些人受奴役、受剥削、受压迫为代价的，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革命”没能够彻底改变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

马克思站在人类的高度来审视革命，审视革命的历史。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共产主义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才具有革命的根本性质。“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1](P170)}共产主义革命不是对具体的人、具体的阶级进行革命，而是要消灭奴役、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更是要消灭阶级本身，消灭“异化”本身，消灭人身上自私的本性。这是共产主义革命与其他一切革命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是一场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只是更换了国家和社会的政治主体，更换了政权组织形式。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先导，并不是社会革命的全部。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典型的政治革命，而且是一场不彻底的政治革命。而在社会革命中，无论是革命的主体，还是革命的对象，抑或是与革命行动毫不相干的人，都会主动或被动地受到革命的改造，受到革命的影响。这也是共产主义革命把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革命理想的原因。

二、“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内涵

既然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要求人的现实生活彻底改变，那么，革命的本质意义就在于“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核心之点就在于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了其“革命”的真实意义：“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1](P171)}革命不是部分地改变人们的生活，也不是表面上改变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批判”和“否定”。它首先是深入到人们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实践活动。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仅涉及了人们的政治生活，并且只是涉及一部分人的政治生活。而人的现实生活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体系，其中的物质生产关系起决定性的作用，推动着人的发展，改变着人的思想观念、社会的意识形态、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人的现实生活过程。革命要求改变人的现实生活，就意味着生产关系、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都成为革命的对象，而且必须成为革命的对象。仅一方面或几个方面改变人们的现实生活都只是片面的革命，都不是革命的本意。

“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的另一层含义是革命的彻底性。换言之，革命要求所发生的变化是根本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每次改朝换代都是一次新的社会变革。但即使出现最英明的帝王、制定最优良的制度也没能触及社会的根基，以至于中国的旧社会远远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进程。革命要彻底，就要准确洞察到社会的主要矛盾，从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寻求改变。凡是不能精准地抓住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要矛盾，就不是彻底的革命。这是革命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从这一方法论出发，认为革命是否彻底关键在于是否破除了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事物。“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同时蕴含了革命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这种“变化”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并推动人类发展的变化。既然革命是从根本上全面变革人们的现实生活，它必然是根据人的自身发展要求而进行的变革。怎样有利于人的解放，怎样有利于社会的进步，革命就应怎样改变人们的现实生活。人们的变化越契合自身的发展规律，就越接近人类自由的理想。革命的本质及其价值取向必然标指了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才能“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完成这一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不仅只代表一个阶级，还代表了全人类。“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1](P171)}无产阶级的反抗与斗争已不再是对某一阶级、某一群体、某些人的反抗和斗争，而是对一切奴役、剥削、压迫的反抗和斗争，是对任何形式的，阻碍他们解放和发展的事物的彻底反抗与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必定深入到人的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能容忍生活当中任何一点带有奴役、剥削、压迫的痕迹存在。共产主义革命也必定是彻底地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现实生活的革命，只要留有一丁点奴役、剥削、压迫的火苗在，革命都将会继续下去。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革命的最后一种形式，也是人类革命的彻底完成。要言之，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才能“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才是革命的本质体现。

既然，革命要“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其内在的要求就是不断地自我革新。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在内的以往一切革命都曾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封建时期，农民的每一次土地革命都重新分配了社会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推翻帝王专政的政治革命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拥有社会的财富和权力。但是即使这些革命在初始时期有过如此积极的意义，即使这些革命使得人类发展有了如此巨大的进步，即使这些革命的影响至今都还在延续，也难逃时代对这些革命活动的抛弃。根本的原因并不是革命主体对革命对象的认知不足，而在于革命主体对自身的改造不彻底。封建时期的农民，因对土地的完全依赖，他们只关心自己对土地的支配权；近代的资产阶级因对资本的过度依赖，则只关注自己对财富的占有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通过改造自身来完成革命，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农民革命因为没有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继续自我革命而被资产阶级夺去了革命的主动权；资产阶级的革命也没有在政治革命的基础上继续自我革命而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热潮。20世纪的世界革命史就可见一斑。

无产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一场自我革命。这种自我革命的意义在于在已经完成了的政治革命基础上不断革命，并对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不断革新。这是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必然要求。政治革命只不过是夺取了改变世界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若仅只停留在政权的更替上，那么政治革命只能是维持社会现状，甚至会导致社会的倒退。只有在政治革命的引领下，对社会进行不断地革命，政治革命才有意义。另外，重新建立起来的新社会也不是永恒的、停滞的，而是不断变化，不断反复、不断运动的，这就会出现新问题、新情况、新事物。在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情况、认识新事物的过程中，仍需要对社会进行不断变革。因此，马克思曾说，无产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要在已经完成了的革命的基础上“不断革命”^{[2](P671)}。

历史上的各种革命大多是以暴力的形式出现的，以至人们通常把革命与暴力联系起来。从原始的意义上说，革命确实包括从肉体上消灭革命的对象。在人类的蒙昧阶段，也只有消灭旧的生命体

才能从根本上消灭一切旧事物。这种革命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社会。资产阶级革命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恰当地诠释了暴力、流血、牺牲的革命形式。因此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对革命都采取谨慎的态度，即使时至今日，当我们谈及“革命”的字眼时，都要敛色屏气。但是，自马克思建立科学社会主义以来，革命就不仅只是暴力，还有非暴力的方式。那么，如何理解革命的暴力和非暴力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是人类的最后一种暴力形式的革命。当然，这种以暴力的方式进行的革命是有自身的前提和条件的。其中最根本的方面是，无产阶级与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矛盾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换言之，矛盾的冲突若再任其恶化、坐视不管，无产阶级自身就存在毁灭的可能，他们已经被逼到了生存的临界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才会采取暴力的形式反抗，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才是彻底的。就暴力革命这一点来说，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和直接目的与以往的暴力革命有相似之处，但根本的差异存在于政治革命之后的社会革命中。

前文已述，以往的一切革命其主导都是政治革命，而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是社会革命。建立在政治革命基础之上的社会革命就是一种非暴力的革命。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上来讲，政治革命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先导。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掌握了政权，也就掌握了社会革命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通过行政手段破除社会各领域中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不适应社会发展，不利于人类解放的一切旧事物，从而完成共产主义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已控制了国家的暴力机关，掌控了社会的物质资料，主导了国民的思想舆论，所以它可以用教育、法令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革命目的，也就避免了流血、冲突、牺牲的暴力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非暴力的革命形式叫做改革。非暴力的革命也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采取非暴力的革命形式。其中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这里的“强有力”指的不是它掌握有多强大的暴力机关，也不是指它有多雄厚的经济财富，而是指它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能体现人民的根本意志，它能引领人类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有资格和能力担当这一重任，也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通过非暴力的形式完成社会革命。如果说，暴力革命是与自身的对立面进行斗争的话，那么非暴力革命就是革命主体的自我革命。相对于通过暴力推翻政权的政治革命，这种非暴力式的自我革命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持存更长、作用更大、影响更深。

三、“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普遍意义

按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社会主义改革是共产主义革命中非暴力革命的那一部分。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必然带有革命的性质。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3](P113)}。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对于中国至今的整个改革开放历程来说都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继承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首先，改革是深入到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去的变革。马克思认为，构成人的现实生活的最基本的方面是物质资料生产，人的生存的前提是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整个社会能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资料，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且，因为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所以它解放的是每一个人的生产力，发展的是每一个人的生产力，增加的是每一个人的物质财富，提高的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中国的改革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中。其次，中国的改革不是浅尝辄止、表

面文章，而是一场不间断的、只会愈演愈烈的变革。仅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经济的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并存，这些机遇稍纵即逝，风险变幻莫测。如何应对市场的挑战，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只有不断地改革、不断地根据市场的变化制定有效的政策，才能保持国内经济的稳步增长，才能维持人民生活的物质需要。不断地改革也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P166)}。最后，中国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中国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变革，改革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改革为了中国人民。也就是说，改革是中国人民自己对自己的一次改造和洗礼。中国共产党根据人民的意志和意愿制定改革的各种方针和政策，他们代表人民行使改革的权力，因此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而改革的最终受益者也是中国人民自己。改革祛除了人民自身发展的障碍，使自己更适合这个社会，使自己相对于过去更自由、更全面。就此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改革是广大劳动人民通过改变自己生产生活的条件，从而改造了自己，解放了自己，发展了自己。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发展。其一，中国的改革不是固步自封、闭门造车，而是汲取了人类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进成果。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中华民族的进步是人类进步的一个环节。因而，中国的改革决不能脱离世界的主流。应当客观地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要领先我们一步，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服务管理、民生保障等领域。在这些人类发展共性的领域内，中国的改革理应解放思想、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这样，中国的改革才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才契合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其二，中国的改革是从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是有重点和中心的。中国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的改革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的。这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深化、具体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改变社会的整体面貌，就必须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主要矛盾，从生产力与经济基础这两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无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所有制，都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领域中的变化，从而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稳固。只有完成了这一变革，社会的全面变革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为改革确立了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是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具体的问题域、具体的国家和民族中的实践展开，从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的革命观。

改革作为一种非暴力形式的革命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统一的。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说，只有社会主义的改革才能算是革命。这里是要区分社会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改良的差别。资产阶级自掌握国家政权之日起也不断根据世情国情的变化推出新的政策、采取新的措施，他们也自称为“改革”。但依照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们的“改革”最多只是改良。资本主义改良的最显著特征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去片面地改变一些政策、法律、法规，在表面上作出“改革”的姿态。资本主义改良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不是彻底解决社会矛盾。

资本主义改良之所以不能称为改革的原因在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改良只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当权的统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大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政体。几个政党轮流执政，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改良是执政党赢得选票、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最好办法，也是最能吸引选民的理由。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不得不改变现状时，执政党当局就会改变现行的政策、法律、法规来遏制矛盾的恶化，从而缓解自己的执政压力，也缓和了与其他政党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二，资本主义改良只是表面的、部分的改造，而不是根本性的变革。既然改良是为了维护既得政权的地位，那么改良必然触及不到既得权利者的根本利益。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

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利益做支撑，而支撑起这个物质基础的是社会上占少数的几个特殊利益集团。如果改良破坏了这些物质利益的根基，资产阶级也就无力再统治这个社会了。因此，当人民与政府、社会与国家的矛盾演化到一定程度时，资产阶级统治者会让出一部分利益来满足民众的需求，这就是改良的“真面目”。由此可见，改良并没有“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它根本没有深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去。

第三，资本主义改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动的。资产阶级执政者为了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就必须尽量维持现状，一般不会主动求变。只有当现实的矛盾威胁到自己的执政地位时才会采取措施。这与改革有很大的不同。改革是要彻底地、根本地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改革者及早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问题。改革是主动地寻求改变，以使自己处于社会发展的有利地位；资本主义改良则是被动的违心之举，以使自己苟且求生。

第四，资本主义改良的最终结果只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恶化。改良也许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积极的效果，但那毕竟只是“缓兵之计”。经过短暂的社会稳定之后，矛盾会以更加恶劣的形式爆发出来，并且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破坏更大。全球的经济危机、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地区冲突等都是社会矛盾发展到极端的后果。改良的最终结局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这是马克思做出的科学预言。相反，改革使得社会主义长存。改革本身就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并存共生。改革的目标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社会主义的理想不也正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吗？

综上所述，改革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才得以可能，也只有社会主义改革才称得上是革命。如同邓小平所言：“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4](P693)}

四、“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特殊意义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成果显而易见。40 年间，中国人民从贫穷落后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国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提前完成了基本实现小康的伟大目标，温饱问题基本解决。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方略，中国的物质财富总量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早已成为了经济大国，科技文化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应该说，40 年的改革使中国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的发展还在继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还未实现。40 年的成就同样意味着有更大的困难、更多的问题、更复杂的情势摆在我们面前。就中国人民引以为豪的经济领域而言，虽然我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总量却掩盖不了发展失衡的问题。贫富差距仍然存在，东西部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去甚远，即使在同一地区内发展的程度也参差不齐，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失衡则引起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的失调。中国的发展到了历史的关键点，中国的改革到了历史的转折期。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再次摆在了党和人民的面前，但险境重重。这一境况深刻地体现了中国改革的特殊性。中国改革所遇到的以上挑战是一个由前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局限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三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问题域。这也是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所在。因此，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路线。而当前阶段的最大阻力就是如何面对固化了多年的旧的体制机制。这些旧的体制机制不仅代表着旧的制度、旧的规范、旧的模式，而且代表着旧的思想观念，关系到既得利益群体。这意味着改革要牵动到部分人的利益，触及部分人的保守的世界观、价值观。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要面对的是“难啃的硬骨头”^{[5](P13)}。如果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退却，那么中国的发展就将停滞不前。如果没有踏过“深水区”，没有啃掉“硬骨头”，中华民族就将被历史所抛弃，遑论实现伟大复兴。面对“深水区”和“硬骨头”，改革就应更

全面、更彻底、更深刻。所以，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期，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必经之路。全面深化改革同样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是对“共产主义革命”思想更丰富更具体的意义呈现。

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在全面，关键在深化。“全面”意指改革的抓手要伸向社会的所有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的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的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的改革”^{[5](P23)}。在过去的改革历程中，因为我国特殊的国情，改革的重心一直偏向经济体制，如今，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已不仅仅只受到经济体制的制约，而且还受到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制约，所以，改革的视野必然扩展到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领域，达到全面覆盖。“深化”意指在原有的改革成效的基础上，“将改革进行到底”^{[6](P107)}。社会主义改革的本意就是要触碰问题的根本方面。深化改革是针对改革当中所遇到的“禁区”。这里说的“禁区”指的是那些固化了的并涉及当权者切身利益的旧的体制机制。这些“禁区”就是改革的“深水区”，就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若要“进行到底”就要深入“禁区”，咽下“硬骨头”。只有这样才能祛根治本，才能说我们的改革是彻底的。

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实践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准，经济体制的改革直接关系到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程度。一个好的经济体制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让政府的作用发挥得恰到好处。主要是要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确保生产力遵循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依据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调整生产供给结构，促进供给质量，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变化的物质精神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关键举措，也是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必由之路。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关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主人是全体劳动人民，国家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社会的权力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向。建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牢笼，让社会权力由制度本身发挥作用，从而避免其被私人意欲操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是从此点出发，把社会公权的人民性和规范性推向统一，从而实现还权于民、用权为民。三、文化体制改革旨在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有物质方面的要求，还要有精神方面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样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水平。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设，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贯彻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心底。关键点是全面深化舆论管理机制、教育体制以及新闻出版制度的改革，为社会主义建设营造积极向上、充满活力、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改革，也是深入人们现实生活的改革。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涉及每一个人的工作、生活、教育、就医、住房等一系列领域，贯穿于每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国民的幸福感，直接决定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与拥护度。全面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重心是完善一系列民生制度，特别是在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中全力解决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全面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要从人们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中革除那些有碍于人民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因素，使每一个人的生产力都彻底地发挥出来，服务于社会。五、生态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是正确处理好人的发展与自然规律之间的关系。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对自然生态的管理就是对自己的管理。如何在人的发展过程

中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又如何在社会进步中合理利用资源，这是生态管理体制改革的主题。全面深化生态管理体制改革的要建立相关奖惩机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实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生态管理体制共同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自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就已标志着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那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许多具体的制度还有待完善。改革开放正式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新时期的党中央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其中“完善和发展”的意义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也不是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先进、更适合时代的要求，它改的只是方法。同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其他什么现代化。纵观世界，各国都有各国的治理体系，每一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国情创制相应的治理方案和治国策略。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方案和策略，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方案和策略。就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具体方案和策略都有所不同。我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最基本的国情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的改革之路相较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本质差别。我国国家治理的对象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其主体是中国人民，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所应当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无论是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内容来说，还是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更是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具体实践。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深化改革同样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是一场深刻的革命”^{[7](P348)}。

全面深化改革是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在实践中的彻底展开与完成。与过去的改革侧重于几个重点领域不同，全面深化改革在内容上涉及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面涵盖了人们现实生活的所有领域，大到国家的治理，小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细节。针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长远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不是零敲碎打，不是逢场作戏，更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它是对坏的东西、旧的东西进行彻底的摧毁重建，对现存问题与矛盾的斩草除根，以求“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新时代下，不仅要破旧的东西进行革新，我们还会遇到全新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的社会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新时代的新问题。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只有路途，没有终点；只有台阶，没有山顶。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矛盾也随之不断运动变化。矛盾的运动正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解决矛盾的方法、让矛盾运动起来的动力就是改革。改革也和矛盾一样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改革的过程会产生出新的矛盾。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新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正就是“不断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也是马克思“不断革命”思想在中国改革中的生动体现。我们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也是中国人民的一次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必先以身作则，担当先锋。改革的先锋不仅要引导改革、引领改革，还要勇于自我革新、敢于自我革新。只有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才能有资格去指导全国人民的共同变革。全面深化改革改的是人民自己的生活，也是为人类自身发展扫清障碍。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人们在改造对象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全面深化改革正就是人们自己对自己的彻底改造，同样也是马克思“自我革命”思想的有力呈现。党的十九大庄严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8](P2)}。因此，新时代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必定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8] 人民日报社评论部.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The Thought of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The German Ideology*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YU Gen-xiong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China’s reform today urge us to re-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y view of Marxism and China’s socialist reform. In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expounded the thought of “communist revolution”. According to Marx,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and all other revolutions lies in whether it has completely changed people’s living situation; real revolution is not a “superficial article”, but a change that goes deep into people’s real life; the revolution is no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deal that the reality should adapt to”, but “the movement of eliminating the existing situation”; in essence, the revolution is an innovation in which people transform themselves. The cours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oves that China’s socialist reform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communist revolution” thought in China, also “the seco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in the new era i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Marx’s “communist revolution” 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socialist reform, which is “a profound revolution”.

Key words: communist revolution; socialist reform; social revolution; political revolution

(责任编辑 孙 洁)